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 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章舜粤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要: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 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 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 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 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 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 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 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黄帝陵; 祭祀; 典礼制度; 精神标识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 (2021) 05-0024-11

DOI:10.13727/j.cnki.53-1191/c.20210903.001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奉祀传统。正如《礼记·祭统》所言“礼有五经, 莫重于祭。”祭祀是中华礼制的核心之一, 黄帝祭祀则是其中重要内容, 黄帝历史叙事也对现实政治产生过巨大影响。^①但近现代中国^②对黄帝的重新阐释与祭祀与之相较有着重大差别。在古代社会, 黄帝或搭配以五行学说, 以白青玄赤黄五方上帝之一在皇帝祭天时随祀; 或作为“三皇五帝”^③等古代先贤帝王之一接受国家祭祀等。^④而晚清以来的黄帝陵祭祀则是在近代中国面临民族危亡之际, 将黄帝重新阐发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始祖的背景下, 以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为鹄的所进行的仪式操演。对此学界已有一些研究, 如研究黄帝符号与晚清时期民族主义构建的关系,^⑤或在抗战时期国共关系视角下讨论黄帝陵祭祀,^⑥或讨论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对黄帝陵祭祀的新意涵。^⑦但其不足在于一是缺乏整体性视角, 二是对台港澳同胞和

【作者简介】章舜粤,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研究”(21ZDS074)、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规划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问题研究”(2020ZDGH017) 阶段成果。

- ① 郭津嵩 《公孙卿述黄帝故事与汉武帝封禅改制》, 载《历史研究》2021 年第 2 期。学者认为齐地方士公孙卿在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 年)为汉武帝讲述的黄帝故事, 在武帝封禅改制运动的谋划和展开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 ② 本文所指的“近现代”是指 1840 年以来的中国, 包含了 1949 年以来的当代中国。
- ③ 关于“三皇五帝”, 古籍记载有多种说法。如孔安国《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以黄帝为三皇之一。而五帝自战国以来也有多种说法, 司马迁《史记》将黄帝列为五帝之首。由于《史记》在中国古史叙事上的权威地位, 这一说法流传最广。
- ④ 黄帝在古代祭天和祭帝王等仪式中的身份历经多次变化, 有学者将之称为“由人而神, 由神而人”的衍化路径。见汤勤福《人神之际: 古代中国五帝祭祀的变迁(上)》, 载《河北学刊》2019 年第 5 期。汤勤福《人神之际: 古代中国五帝祭祀的变迁(下)》, 载《河北学刊》2019 年第 6 期。
- ⑤ 见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 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 28 期, 1997 年 12 月。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 载《历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
- ⑥ 见李俊领, 殷定泉《抗战时期的黄帝陵祭祀典礼》, 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5 期。李俊领:《仪式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 载杨凤成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 2 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
- ⑦ 章舜粤《一九四八至一九六三年中共祭黄帝陵活动研究》, 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 年第 2 期。

华人华侨的祭陵活动研究不够。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视察时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①。本文即将近代以来的黄帝陵祭祀置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域下加以讨论，以期找到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探究其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意义。

一、晚清革命党人对黄帝陵祭祀的改造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发

隋唐以前对黄帝的祭祀多于郊庙祭祀，即将其作为五方上帝之一或五人帝之一在祭天时随祀配祭。^②明代朱元璋废除了在祭天时以五方帝从祀的传统，在京师设置历代帝王庙。^③伏羲、神农和黄帝作为三皇，“开天立极，大有功德于生民者”，与汉高祖等汉唐宋创业之君同于帝王庙中受祭，并“京都有庙，春秋享祀”。此后又“定以每岁春，附祭历代帝王于郊坛，秋祭于本庙，每三年传制遣道士齎香帛，令有司祭于各陵寝”，即每隔三年派员前往黄帝陵等地祭祀。^④这一祭祀制度为清朝基本所沿袭。此外，明清两朝除常规祭祀外，往往于皇帝登基、平息叛乱、国家庆典等时，又派专员赴黄帝陵祭祀。清政府最后一次遣员致祭为道光三十年（1850），此后直至清朝灭亡，60年间竟无派员祭祀活动。^⑤晚清陕西同盟会秘密祭黄帝陵，性质则与此前封建王朝所有祭陵活动不同，开辟了近代以来祭黄的新传统。

要明晰1907年陕西同盟会祭黄陵的新内涵，不得不先讨论明清两代祭祀黄帝的意义。元朝虽设立三皇庙，但却是将伏羲、神农和黄帝视为医圣加以祭祀，派“医师主之”。对此，朱元璋认为“天下都邑，咸有三皇庙，前代帝王大臣皆不亲祭，徒委之医药之流，且令郡县通祀，岂不亵渎？”故查考唐代先例，将三皇祭祀升格为帝王之祭，“命天下郡县毋得褻祀，止命有司祭于陵寝”。即将黄帝祭祀权收归中央，并采纳礼部意见，将上古圣王和汉以下之创业英主和守成贤君一体祭于陵寝，并于洪武六年（1374）建历代帝王庙，在京师实行庙祭，最终建立了三皇、五帝、三王、汉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共十七帝的历代帝王祭祀系统。^⑥

虽然朱元璋建立明朝以驱逐异族，恢复唐宋为号召，认为元朝“昧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虏之俗”，礼仪制度“实非华夏之仪，所以九十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⑦。但在他所创立的祭祀系统中，尽管黄帝的地位大大提升，但民族色彩并不浓厚，而是以“圣王”代“医祖”，体现的是儒家对上古神圣帝王的推崇，并非对“夷夏之辨”的宣示。尤其是两晋南北朝和辽、金之君落选，而元世祖忽必烈虽为异族，且系被推翻的元朝君主，却得以入祀，更明确说明这一祭祀系统重在彰显对历史上“大一统”的正统王朝的继承。^⑧

清朝基本继承了这一祭祀传统。并且，康熙皇帝认为此前历代帝王庙所祭祀者每朝不过一二位，是“皆因书生妄论而定”“况前代帝王曾为天下主，后世之人俱分属臣子，而可轻肆议论，定其崇祀与不崇祀乎”^⑨。自此，则除无道、被弑、亡国之君外，历代帝王均得以入祀，到乾隆年间已有188人。^⑩如此则黄帝在清朝祭祀系统中的地位更“泯然众人矣”。因此，虽然有清一代祭黄陵次数达30次，远超此前历

① 赵世超《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载《陕西日报》2015年10月9日。

② [日]金子修一：《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肖圣中，吴思思，王曹杰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③ 汤勤福《人神之际：古代中国五帝祭祀的变迁（下）》，载《河北学刊》2019年第6期。

④ 李媛《明代国家祭祀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274页。

⑤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黄帝陵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117页。

⑥ 李媛《明代国家祭祀制度研究》，第273～274页。

⑦ 《明太祖实录》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83页。朱元璋《御制大诰》，《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43页。转引自汤勤福《人神之际：古代中国五帝祭祀的变迁（下）》，载《河北学刊》2019年第6期。

⑧ 朱元璋定鼎之初，此举有其接续正统的需要。而到明中期，嘉靖君臣认为“元本胡夷”“元世祖以夷乱华，不宜庙祀”，才将元世祖黜出这一系统。参见《明世宗实录》卷296，嘉靖二十四年二月庚子条。见李媛《明代国家祭祀制度研究》，第273～274页。

⑨ 《清圣祖实录》卷49，康熙六十年四月丙申条。转引自赵世明，余粮才《清季以黄帝祭祀为中心的国家认同构建》，《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⑩ 王秀玲《清朝历代帝王祭祀与民族国家认同》，载《前沿》2015年第5期。

代,^①然而正如有论者所言,“黄帝除了治统之源的意义外,似乎已无特别之处”^②。总而言之,黄帝在近代主要不是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而享受的祭祀。

近代以来,中国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开启了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黄帝符号扮演了极为特殊的角色。革命党人为策动反满革命,将黄帝由从上述的中华帝系之首逐渐转化为“中国民族开国之始祖”,“黄帝子孙”成为当时最具号召力的身份认同。1903年,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宣称“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而黄帝乃“吾四百兆汉族之鼻祖”“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③。1905年,黄节于《国粹学报》分期发表《黄史》一书,强调要写一部“统于黄帝,以迄今日,以述吾种人兴替之迹”的汉族史。^④这一时期,《民报》《江苏》等革命党人的期刊纷纷刊登黄帝画像,并将之称为“中国民族开国之始祖”^⑤。在这一新共同体的构建进程中,除了国史书写、挖掘和创制黄帝画像、发明黄帝纪年法等方式外,黄帝陵祭祀也是重要手段之一。

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井勿幕回到陕西组织筹建分会。为壮大革命力量,井勿幕、高又明等决定与新军和“慕亲会”“三合会”“匕首会”等会党组织联合,在大雁塔举行会议,“公推郭希仁、张翊初起稿拟祭黄帝陵文后,并议以黄帝为纪年”,并与各成员约定于重阳节前齐集黄帝陵附近各地,“以准备于时恭祭”。1907年重阳节,^⑥共有陕西、四川、广东、山西、甘肃等共二十余人,或扮作商人收买野兽皮子,或假装进山打猎,或假装成考察煤炭、石油,齐聚黄帝陵进行祭祀。井勿幕深感黄帝陵祭祀的仪式“有形有色”,比文字宣传更加“深刻有效”,因此与同志研究参考“慕亲会”仪式加以改良,“为推进任务之基本形式”^⑦。

此次黄帝陵祭祀收取了良好的效果。祭祀之时,“竟有多人情难自持,高啸大哭,若丧考妣,于祭之人,无一不落泪的”,吴希真甚至“两天之内饮食亦不欲进”^⑧。可以说,黄帝陵祭祀极大地激发了参与者的民族情感,达到了革命党人宣传其意识形态的目的,促进了同盟会众与新军、会党组织的联合。武昌首义后,陕西成为北方地区率先起义宣布独立之地,“慕亲会”等会党力量组建的“洪汉军”即为起义的两军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黄帝陵祭祀有几个特点。一是明显带有晚清革命党人的汉族中心主义色彩。祭文称黄帝为“我皇祖”而自称“玄曾孙”,构建了以黄帝为中心的华夏与满清政权为代表的“夷狄”相对立的历史叙事。祭文称黄帝“奠基中夏”,而由“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华夏正统所继承延续。清军入关系“建州虏夷,乘我丧乱,驱其胡骑,入我燕京,盗踞我神器,变乱我衣冠,侵占我版图,奴役我民众”。因此,同盟会同志“誓共驱除鞑虏,光复旧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以纾民生之苦,以复汉族之业”^⑨。二是在仪式上带有明显的秘密社会色彩。所谓“慕亲会”即陕西的哥老会,井勿幕将其秘密仪式加以改造为同盟会仪式。如将“告墓文”改为更雅驯的“誓墓文”,在开会前拟就并“在开始上香献饌时朗读之”,总结一年工作,重申会规等,并在供奉神位中加入“驱逐异族人”的岳飞、关公。^⑩

在这次同盟会密祭及革命党人的有关宣传中,黄帝不再是官方祭祀和传统历史叙事中的国家政统、帝

① 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第118页。

② 赵世明,余粮才《清季以黄帝祭祀为中心的国家认同构建》,载《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③ 刘师培《黄帝纪年论》,载张柑,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721~722页。

④ 黄节《黄史》,载《国粹学报》1年1号。

⑤ 日 石川祯浩《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论》,载《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⑥ 关于此次祭陵,向来有1907年和1908年两说。学者王民权等根据此次祭黄帝陵文采用的“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五年”,核对当时流行的几种黄帝纪年法,认为应为1907年,考订颇为精当,本文采用此说。见王民权,王广利《陕西同盟会重阳节祭黄帝陵年代考》,载《陕西史志》2004年第6期。

⑦ 高又明《如是我见我知录》,载西安市档案馆编《西安:辛亥记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149页。

⑧ 高又明《如是我见我知录》,载西安市档案馆编《西安:辛亥记忆》,第149页。

⑨ 《一九零八年同盟会祭文》,载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44页。

⑩ 高又明《如是我见我知录》,载西安市档案馆编《西安:辛亥记忆》,第150页。

王世系之源，而是整个中国民族之始祖。换言之，黄帝子孙也不再是尧舜禹汤、唐宗宋祖的天潢贵胄，而是指称整个民族的每一分子。这一切使得黄帝符号成为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象征。同时祭陵行为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悄然打破了皇室垄断祭祀的权力而转向民间，并在后续的发展中逐渐为民间和现代民族国家所用。当然，由于革命党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意识形态，其话语系统下黄帝“中国民族开国之始祖”的新身份主要是对汉民族而言。黄帝及黄帝陵祭祀要成为更为接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号象征，还有待发展成熟。

二、民国时期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震动天下，清王朝统治开始瓦解，中华民国由此建立。10月12日，黎元洪以革命军都督名义，在武昌阅马场筑坛，率将校士兵等“谨以太牢元酒之仪，恭奠于黄帝在天之灵”，并宣读《祝文辞》《誓师辞》《檄全国文》等。其《祝文辞》称“以黄帝接中华文明之国，演神明奕稷之祚，绵衍至今，越四千余岁，达四百兆人”。《誓师辞》称“我祖黄帝建邦于中土，世世先哲明王”。《檄全国文》称“粤维我祖轩辕，肇开疆土，奄有中夏，经历代圣哲贤豪之缔造，成兹文明古国。凡吾族今日所依止之河山，所被服之礼教，所享受之文物，何一非我先人心血颈血之所遗留”^①。这一黄帝祭祀仪式与1907年同盟会黄帝陵祭祀在形式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均以黄帝为汉族始祖，强调排满的民族主义。同时军政府亦以黄帝纪年，并以黄帝子孙为号召，传檄四方。如檄告各省督抚疆吏称，“贵大臣亦黄帝子孙”，希望其“共襄汉室，拯同胞于水火，复大汉之山河”^②。总之，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黄帝祭祀和黄帝符号在增强共同体认同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民国肇建后，要寻求中国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而不仅仅以所谓的“汉地十八行省”作为新生的中华民国的构成，则再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排除出中华民族显然已不合适。“五族共和”取代“驱逐鞑虏”成为更得人心的口号，中华民族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③事实上，早在晚清即革命党人构建其黄帝新符号时，改良派亦将黄帝重新阐释为中华民族之始祖。早在1900年，梁启超就任在其名文《少年中国说》中称中国为“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之地，将中国土地上诸民族均称之为黄帝子孙。^④梁启超试图以中国国民的共同认同超越革命党人的种族革命叙事，指称“我中国现在之领土，则黄帝以来继长增高之领土也；其国民，则黄帝以来继续吸纳之国民也；其主权，则黄帝以来更迭递嬗之主权也”，以此论证中国历史上从未亡国，满清入主中原并非如革命党人所说的异族灭亡中华。^⑤满人之中，也不乏自诩为黄帝子孙者，以超越满汉界限。如清宗室盛伯义在其长诗中称，“起我黄帝胄，殴彼白贱种，打破旗民界，谋生皆任便”^⑥。

在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很快转而认同梁启超等人将汉满蒙回藏等中华大地上一切民族融为一个中华民族的观点，以求得国家的完整统一，而黄帝符号也转而以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为更多人所接受。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然而正是在民族危机之中，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认同感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得以大大增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黄帝陵祭祀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1933年8月22日，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中央党部党史史料编撰委员会主任、立法院院长的邵元冲，收到西安西京日报社社长丘元武寄来黄帝陵相片多种，大受启发。他当晚阅读《陕西通志》，第二天即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谈话，称“黄帝为中华民族之始祖，故陕西中部县之黄帝陵，应崇其祀典，斯

①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84~85页。

②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90页。

③ 关于“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发生、演化，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④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载《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0页。

⑤ 梁启超《杂答某报》，载《新民丛报》第84号，1906年。

⑥ 《宗室伯义先生题康孝廉万柳堂图遗稿》，载《大同报》第2号，1907年6月27日。转引自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

亦提倡民族主义之原也”^①。1935年,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正式采纳这一建议,为“提高民族意识、尊崇祖贤起见”,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民族扫墓节”,由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派员前往黄帝陵、周陵、茂陵、昭陵等致祭。^②该年祭黄帝陵时,国民党中央的祭文已经不再将黄帝称为“我皇祖”,而改称“中华民族始祖”^③;国民政府祭文也称“弘惟五族,仰托灵庥,远遵盛轨”^④。同盟会元老于右任在该年出版的《黄帝功德纪》中也称黄帝“子孙蔓延于各地也”,汉、藏、回、苗、蒙等“中华民族之全体,均皆黄帝之子孙也”^⑤。

相较于国民党在黄陵祭祀中刻意凸显“一统之业”^⑥,中国共产党以“民主共和,改革内政”“还我河山,卫我国权”^⑦为口号,直指民族危急存亡之际的现实,显然更能引发共鸣、团结全国人民。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要求“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并表示“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⑧。1937年清明节共产党参与祭黄陵时,毛泽东所亲撰祭文称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号召“不论军民,不分贫富”,建立民族阵线,“四万万众,坚决抵抗”^⑨。七七事变发生后一周,国共尚未正式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朱德为奔赴抗日前线的红军将士题词说“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本出中国,何以为人!”^⑩慷慨陈词之中,亦高举黄帝符号的旗帜以激发全国民众的民族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黄帝陵祭祀不仅有国民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参加,还有“桂考察团张任民等代表李宗仁白崇禧,董英斌、吴家象等四人代表于学忠等部参加陪祭”^⑪。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尚未正式结成统一战线,蒋介石尚未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因此除延安蜡版刻写的《新中华报》公布的消息外,世人在其时并不知道共产党在祭陵中的存在,仅知道桂系和东北军亦参与了此次祭陵。但回到当时的政治情境,可知桂系和东北军参与祭陵亦有重大意义。1937年清明之际,离桂系李宗仁等人发动的两广事变刚结束半年多,蒋桂关系尚属微妙。1936年底爆发的西安事变善后事宜尚在进行之中,蒋介石正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化大为小,化强为弱。国共双方还在为如何实现合作进行谈判。因此,如桂系在祭文中所言“宗仁等职在方隅,心仪匡济,清明序候,弥惊国难之殷”^⑫和东北军参与祭陵“以示尊崇整个民族祖宗之意”^⑬,体现出全国各党各派为民族存亡而捐弃前嫌,一致抗日的意愿,对振奋全国人民抗战意志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⑭

1907年同盟会祭陵虽然开了黄陵祭祀新意义的先河,但毕竟是小范围内的秘密祭祀,且采用了传统会党仪式,未能成为国家层面的现代仪式操演。应该说,黄帝陵祭祀从1935年成为“民族扫墓节”后,才正式开启国家层面的制度化进程,成为现代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大型文化仪式与政治仪式统一体。对此,国民政府有一定自觉之认识。1943年10月,由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召集丁惟汾、陈立夫等人,在重庆北碚北温泉召开礼制讨论会,以制定《中华民国礼制》。会议认为,“中华民族之信仰,以敬天、

① 邵元冲《邵元冲日记》(下),王仰清,许映湖整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22页。

② 《下月六日之首届民族扫墓节》,载《中央日报》1935年3月23日。

③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祭文》,载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49页。

④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国民政府祭文》,载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51页。

⑤ 于右任《于右任集》,刘永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页。

⑥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祭文》,载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58页。

⑦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祭文》,载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56页。

⑧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载《新中华报》1937年2月13日。

⑨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祭文》,载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55~56页。

⑩ 朱德《朱德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

⑪ 《中央代表张继等祭谒黄陵 顾祝同致祭周茂陵 马超俊主祭明孝陵》,载《申报》1937年4月6日。

⑫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李宗仁、白崇禧祭文》,载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60页。

⑬ 转引自陈晋《读毛泽东札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9~50页。

⑭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此次黄帝陵祭祀成为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角力场。

法祖为极则”。因此，会议所拟的礼制草案中，第一篇《吉礼篇》第一章《祭祀》中的第一节为《国祭》，规定“先贤及有功德于民与革命先烈及有大勋于国者，皆隆礼祀”。而“黄帝为中华民族之始祖”，故而“祭黄帝陵”位列国祭第一，排在“祭国父陵”（即中山陵）、谒国父陵、祭至圣先师孔子和祭历代先圣之前。且黄帝陵又与中山陵和孔子成为国祭中之最高一等，由国民政府主席亲祭。^①

概言之，民国时期的黄帝陵祭祀正式成为标志性的国家仪式，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象征之一，影响遍及中华民族各个群体。1940年，华侨领袖陈嘉庚为支持抗战事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5月31日在赴延安途中，陈嘉庚专门安排了谒祭黄陵活动，祭毕还向县长和当地学生百余人发表演讲，表示此行“代表南洋千万华侨，回国慰劳考察，鼓励抗战民气”^②。1941年，时任成吉思汗陵奉祀官的伊克昭盟郡王旗扎萨克图布升吉尔噶勒萨克由重庆北返榆林，途中“曾在中部亲祭黄帝陵，仪式隆重”，据称是蒙古王公中致祭黄帝陵的第一人。^③此举等同于将黄帝视为与成吉思汗同等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少数民族同胞回应了关于黄帝是汉族之祖还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祖的争议。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丘念台、林献堂等台胞于1946年组建台湾光复致敬团，赴南京等地向国民党当局陈述政见，并于耀县遥祭黄帝陵。祭文称黄帝为“国祖”，而台湾同胞为“汉裔”东渡而来，抗战胜利“旧耻尽雪，旧土重享”“特向告祭”。林献堂并于祭后演讲表达台湾人民心向祖国之情“光复后已觉有可爱护的国家，可尽忠的民族，永不愿再见到有破碎的国家，分裂的民族”^④。

以上种种表明“黄帝子孙”已成为包括少数民族同胞、海外华人华侨和台港澳同胞等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身份认同，黄帝陵已成为中华民族心目中的民族圣地，而黄帝陵祭祀也成为其表达和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仪式。

三、新中国成立后黄帝陵祭祀的与时俱进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加强

1948年3月10日，黄帝陵所在黄陵县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和平解放。虽然全国解放尚待时日，但新生的人民政权从1948年清明节起，便开始祭祀黄帝陵，并赋予其新的解释与功用。一是赋予了黄帝以“劳动人民的先驱”这一新意涵，加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如1948年陕甘宁边区祭陵祭文称，“伟大的轩辕黄帝，你是我民族的始祖，你是我劳动者的先人，历史的创造者，从你那一时代起，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即劳动生息繁衍于这幅广大的领域，并以自己的劳动团结和努力不断战胜黑暗，争取光明”。^⑤1951年黄帝陵祭祀中强调中国历史的成就是“自轩辕黄帝以来中国人民的劳动创造和伟大发明”。^⑥二是通过黄帝陵祭祀，强化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以“黄帝子孙”的共有身份认同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台湾同胞、海外华侨华人等做统一战线的工作。三是通过黄帝陵祭祀传达政治主张，动员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⑦

1964年黄帝陵公祭活动中断，改革开放后于1979年恢复并延续至今。这一时期的黄帝陵祭祀有两大特点。一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二是在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与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等全体黄帝子孙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979年，延安地委、黄陵县委决定小规模恢复黄帝陵祭祀。在刚刚过去的极“左”年代，祭祀一度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许有鉴于此，省委负责人指示认为“祭扫规模不宜过大，不讲话、不见报，献花圈”“祭扫仪式不要带迷信色彩”^⑧。最终决定祭扫仪式“只献花圈，不讲话，不致献词，不搞献

① 国立礼乐馆编《北泉议礼录》，重庆：北碚私立北泉图书馆印行，1944年版，第1~3页。

②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55~156页。

③ 《伊盟图扎萨克祭黄帝陵》，载《申报》1941年9月15日。

④ 肖军《“台湾光复致敬团”大陆行始末》，载《台声》2006年第10期。

⑤ 《刘副主席、赵副司令员、甘主任代表西北各界隆重谒祭黄帝陵》，载《群众日报》1948年4月10日。

⑥ 《农历清明佳节西北各界公祭黄帝陵》，载《光明日报》1951年4月7日。

⑦ 章舜粤《一九四八至一九六三年中共祭黄帝陵活动研究》，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2期。

⑧ 《七九年清明节祭扫黄帝陵有关负责同志指示》，陕西省档案馆藏，档号：185-2-6352-4。

饭”^①。但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黄帝陵祭祀在仪式上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向传统文化复归。如自1980年起,即恢复了祭文,“稿文以半白话文形式为宜”^②。事实上,自1981年起,祭文即基本恢复到传统的骈文体。^③在仪式上,也越来越富有传统文化色彩。1986年有关部门提出改进公祭仪式,“按照民族形式举行公祭典礼。主要改进有:增设祭品、改纸制花圈花篮为鲜花、改播放录音为古乐队奏乐”等。^④九十年代,陕西省委明确提出要求“按照中国民祭的传统习惯,规范祭祖仪式,使之真正成为具有民族特色,充分体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祭奠活动”^⑤。随着文化自信的不断提升,黄帝陵祭典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不断与时俱进。2006年,国务院批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帝陵祭典”在列。^⑥2013年,陕西启动“黄帝陵祭典活动”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工作。^⑦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上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⑧而正如陕西省政府所曾总结的,黄帝陵祭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有利于“激发人民群众爱国主义精神”,而且“特别是扩大对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宣传、影响,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⑨。

1980年,黄陵县革委会向省人民政府、延安地区行署打报告称,去年恢复黄帝陵祭祀,“虽然仪式简单,使广大群众不够满意,但在海外却引起很大的反响”,提出祭陵“对于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加快台湾回归祖国,激发海外华侨爱国之心都起着重大的作用”^⑩。陕西省对台办亦提出“邀请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和部分在我省工作的台湾省籍同胞前往参加,撰写对台湾宣传稿件和拍摄对台宣传传单照片”^⑪。对黄帝陵祭祀的这一重大意义,省里予以高度赞同,组织了包括省地县各级领导、工农等各界代表和台籍同胞共一千余人,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空前规模的祭扫黄帝陵大会。省领导在大会上的讲话即突出了两个重点,一是“我们的始祖轩辕黄帝,率领华夏部落,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经过长期的劳动和斗争,在我们美丽富饶的祖国大地上,孕育了具有如此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开创了灿烂的华夏文化的历史”“凡我黄帝子孙,无不以此为荣,以此自励”。二是指出“大陆、台湾,共祖共宗,同源同根,我们都是黄帝的子孙、华夏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奔流着同一个民族的血液,我们的性格中,继承着同一个祖先的情操”。因此两岸分离的现状“是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号召“台湾当局一切有识之士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民族前途为重”,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以告慰于我中华民族始祖的赫赫之灵”。这一融合历史与现实的叙事,以黄帝陵祭祀为宣示场域,将包括台港澳同胞等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乃至全球所有华裔置于“黄帝子孙”的共有身份认同之下,奠定了新时期以来黄帝陵祭祀的基调。

1986年,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邀请了22名港澳及海外同胞参加黄帝陵祭祀,“受到了良好效果,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⑫。同年西安交通大学举办建校90周年校庆期间,还组织民国时期教育部次长顾毓琇

① 《关于祭扫轩辕黄帝陵的安排意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号:185-2-6352-2。

② 《黄陵县人民政府关于清明节祭扫黄帝陵几个具体问题和意见的报告》,黄政发[82]57号,陕西省档案馆藏,档号:185-1-3117-2。

③ 参见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102~144页。

④ 《关于一九八七年清明节邀请海外同胞祭扫黄帝陵的请示报告》,陕统请字[1986]026号,陕西省档案馆藏,档号:185-2-7891-11。

⑤ 《关于公祭黄帝陵有关问题会议纪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号:185-1-5662-1。

⑥ 《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06〕18号。

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3年11月29日,http://www.scio.gov.cn/d/fbd/dfbd/Document/1351951/1351951.htm

⑧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⑨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清明节祭扫黄帝陵几个具体问题的复函》,陕政办发[1983]19号,陕西省档案馆藏,档号:185-1-3282-3。

⑩ 《关于清明节祭扫黄帝陵的请示报告》,陕西省档案馆藏,档号:185-2-6572-2。

⑪ 《中共陕西省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请示》,陕西省档案馆藏,档号:185-2-6572-1。

⑫ 《关于一九八七年清明节邀请海外同胞祭扫黄帝陵的请示报告》,陕统请字[1986]026号,陕西省档案馆藏,档号:185-2-7891-11。

等海外校友和外籍华人约50人祭祀黄帝陵，得到省委主要领导的赞许与积极支持。^①自此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人华侨参与公祭者越来越多，据统计至2019年累计“已逾百万人次”^②。

台湾无疑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黄帝符号与黄帝陵祭祀对于台湾同胞亦有相当之意义。甲午战败后，腐朽堕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激起广大台湾同胞的义愤与反抗。“黄帝子孙”也成为台湾同胞宣示中国人认同的重要文化符号。曾写下“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并参与武装抗日的丘逢甲，就多次表白身为台湾人的黄帝认同。他曾题诗怒斥“如此江山竟付人”，感慨“埋碧可怜黄帝裔”^③；“安知海外百万天朝民，一任割屠作人豕。谁非黄炎之子孙，九天忍令呼无门。”^④他的爱国精神和中华民族认同为后人所铭记，前述于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组建“台湾光复致敬团”并率团祭黄帝陵的丘念台，即丘逢甲之子。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退踞中国台湾，海峡两岸由此陷入分离。就祖国大陆而言，一直以黄帝陵祭祀为载体，以“炎黄子孙”的认同感号召台湾同胞，推进两岸统一。从台湾当局的角度来说，最初一方面将祭黄帝陵视为与大陆“争正统”的场域，另一方面也通过祭黄帝陵在台湾地区消除日本殖民统治影响，宣扬中华文化，反对“台独”史观。

1950年，前述“台湾光复致敬团”联名呈请建议“规定台湾全省每年遥祭民族远祖黄帝陵日期，或于清明日民族扫墓节，或于三月廿九日青年节，或于十月廿五日台湾光复节，指定一日，届期全省各县市在就地忠烈祠设香案及民族远祖牌位，向西北遥拜，由省县市长、省县市参议会议长主祭，各民众团体学校代表参加，遥拜后，并向革命及抗日诸先烈拈香。”并称“此虽若末节，而富为国魂寓托，大足以提倡民族精神，消除外来邪说”^⑤。

台湾地区自甲午沦为日本殖民统治后，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消磨台湾人民的抗日精神，散布其“皇国史观”，推行“皇民化”政策，在台湾地区大肆修建所谓“神社”。这种神社以被军国主义改造了的国家神道为宗教包装，推行“一街庄一神社”，至1945年抗战胜利时，据统计竟有“台湾神社”等各级神社和遥拜所等达209所。^⑥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殖民统治者一方面移植其本土的军国主义化的神道教，要求台湾人民改奉“天照大神”，向日本天皇效忠。再如规定学校师生于台湾神社例祭日必须参拜或遥拜奉祀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在镇压台湾人民抗日斗争中死去）的神社。^⑦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祭祀加以改造。如全台第一座神社“开山神社”即由原本奉祀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延平郡王庙改建而来，试图将中国祭祀传统篡改纳入其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宗祀。^⑧

台湾光复后，中国政府认识到日本殖民统治者利用神社及其祭祀仪式展开愚民精神文化攻势，推行“皇民化”运动的野心，为此进行了正本清源，铲除或改建神社的工作。“台湾神宫”被拆除重建为圆山大饭店，供奉侵略者的“台湾护国神社”改为奉祀为中华民国牺牲者的台北圆山忠烈祠，“开山神社”恢复为奉祀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延平郡王祠等等，其余大小神社也多为拆除或改为忠烈祠。^⑨1951年台湾当局首度遥祭黄帝陵即在台北圆山忠烈祠举行，正殿中立有“中华民族远祖黄帝之神位”^⑩。1969年将圆山忠烈祠改建为“国民革命忠烈祠”，大殿正中供奉“国民革命烈士之灵位”，左侧供奉孙中山像，右侧即供

① 《关于组织外籍华人祭扫黄帝陵事》，陕西省档案馆藏，档号：185-2-7891-12。

② 《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参加清明公祭轩辕黄帝活动》，载《延安日报》2019年4月6日。

③ 丘逢甲《题沧海遗民台阳诗话》，《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页。

④ 丘逢甲《少瀛以诗舲自寿诗索和走笔书此》，见《岭云海日楼诗钞》，第288页。

⑤ 《缅怀华夏国魂 年年遥祭黄陵 台光复致敬团呈总统 请规定每年遥祭日期》，载《中央日报》1950年8月26日。

⑥ 李正鸿，杜思雨《浅析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利用神社对台湾和东北的文化侵略》，载《“九一八”研究》第19辑，2020年。

⑦ 蔡锦堂《日治时期日本神道在台湾的传播与局限》，载《东疆学刊》2004年第4期。

⑧ 参见张崑将《从东亚视域看郑成功形象的“中华”意识之争》，载《深圳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⑨ 蔡锦堂《日治时期日本神道在台湾的传播与局限》，载《东疆学刊》2004年第4期。

⑩ 周俊宇《塑造党国之民——中华民国国定节日的历史考察》，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46~147页。

奉“中华民族远祖黄帝之灵位”^①。

台湾“解严”之后,秉持“台独”倾向的人,更因为黄帝陵祭祀中内含的中华大一统色彩而对其提出不同意见,推行“去中国化”。黄帝陵祭祀成为台湾地区不同政治、文化倾向政党、人物交锋的战场之一。2005年5月6日,访问大陆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一行赴黄帝陵祭祀,表示“此次大陆之行的第一站选择向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祭拜”“只要找到‘根’,不忘‘本’,海峡两岸之间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②2005年4月,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团访问大陆西安时表示,“黄帝陵,已成为海内外华夏儿女寻根认祖的圣地”^③。2009年4月4日,中国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参加了黄帝陵公祭典礼。^④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以“时间相近”为由合并举行“2017年向先祖暨忠烈殉职人员致祭”及“中枢遥祭黄帝陵”^⑤。这一做法事实上取消了台当局延续了65年的遥祭黄帝陵活动。可见,是否祭祀黄帝陵,如何祭祀黄帝陵,其实反映了台湾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祖国统一的态度。

四、结语:黄帝陵祭祀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

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生成与发展是历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也不例外。这一共同体的诞生、凝聚与发展,不仅需要土地、人口等实体为基础,也离不开观念上的更新与发展,需要这一共同体中的成员对自己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以及政治认同有自觉之认识。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⑥,即从认同角度对我们提出了新要求,“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⑦。对此,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各民族共建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意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建构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共享的现实文化形式,从中凝练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为全体社会成员生成共有国家认同打下情感和心理基础”^⑧。在这个意义上,黄帝陵祭祀作为一种仪式操演,以现实的文化形式强化了近代以来藉由黄帝符号所构建的历史叙事,即中华民族由黄帝以来五千年绵延不绝这一由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从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扮演了独特作用。特别是对于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更是起到增强对祖国向心力、认同感的凝聚作用。或许正是如此,黄帝陵祭祀自改革开放以来愈来愈受各级政府重视,其典礼规模越来越大,建筑空间越来越高豪华,举办层级也逐步上升,逐渐由改革开放之处由黄陵县主办,升格为陕西省主办,再到陕西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办。且自1992年起就由有关部门提出报告和提案,要求把黄帝陵祭祀的规格提高到国家祭祀。^⑨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一个民族的象征往往可以“通过其符号的确切性和生动性来显示”^⑩。而伟人崇拜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大卫·贝尔在其关于法国民族形成史的著作中所说,“伟人崇拜存在于一个民

① 罗福惠,朱英主编;陈蕴茜等著《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第4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6页。

② 《“慎终追远,不忘根本”——亲民党大陆访问团祭祀黄帝陵侧记》,载《人民日报》2005年5月7日。

③ 《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抵达西安 陕西省委书记会见并宴请连战一行》,载《人民日报》2005年5月1日。

④ 《海内外华人公祭轩辕黄帝》,载《人民日报》2009年4月5日。

⑤ 《消祭黄帝陵 蔡英文“去中国化”数典忘祖》,2017年3月31日,http://www.chetimes.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3&id=12377

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6页。

⑦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

⑧ 沈桂萍《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国家认同的文化纽带》,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⑨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祭黄帝陵典礼活动有关问题的报告》,陕政办字[1996]4号,陕西省档案馆藏,档号:185-2-10617-2。

⑩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页。

族之中”，而“在所有的媒介中，伟人崇拜都不懈地表达其教导性和爱国主义的品格”^①。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帝陵祭祀作为一个现代仪式，自上世纪30年代“重新发明”以来已近百年，不仅在过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巨大贡献，在今天仍有其重大现实意义。

当然，强调黄帝陵祭祀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作用，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围绕这一象征符号所产生的不同声音。如前文所述，早在现代黄帝符号诞生之际，既有革命派和改良派围绕黄帝为汉族始祖还是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符号意义争夺。国民政府设立“民族扫墓节”而祭祀黄帝陵时，“大中国民族主义学会”便认为“黄陵周陵，只能代表汉族”，“蒙藏各族，见民族扫墓只祭黄陵周陵，则知复兴民族之口号限于汉族”，“必分别祭其祖先之陵墓”，从而“追想过去为一部攻击汉族之历史”，则不利于大中国民族的建立。^② 陈寅恪亦认为祭黄陵“非特不能调和民族间感情，反足以挑拨之也”。^③ 近来对此也有争议。葛剑雄认为，“无论如何诡辩，也绝对无法证明，黄帝可能是今天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认为中国是无神论国家，由政府祭黄涉嫌违宪。^④ 马戎亦认为政府祭黄“体现出了民族主义所特有的狭隘性，十分不妥而且客观效果不好。这样的做法不利于民众客观认识各民族族源和各民族文化传统中具有的共同性，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巩固和发展也会造成损害”^⑤。这些不同声音基于“以某一个民族的祖先意识为主的文化符号具有相对排他性”^⑥的判断之上，认为“国家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和民族意义上的族群文化如何共生”^⑦将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换言之，这种意见对是否有可能处理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与现行主流黄帝叙事，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真正呈现多元一体格局提出了疑问。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到中华民族整体史的历史脉络之中，会发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正形成于包括各少数民族对共有历史的书写和共有文化的认同之中。例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统治者鲜卑拓跋氏“主动认同黄帝后裔身份”并建构了一套“源自黄帝、居于北土、与中原华夏同源共祖的族源叙述体系”^⑧。后赵羯族政权亦通过“传统的正朔意识、大一统观念为主要思想框架”以建构起合法性。^⑨ 正如林超民所言，“多线性与多样性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存在于共同性与整体性之中”^⑩。作为一个历史记忆而非血缘标示，黄帝符号并不排斥少数民族的融入，而恰恰是在中国各民族相互交流与共同发展中，“在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形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⑪后，所形成的一个共同体文化认同。这一共同体文化认同之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内凝聚力量，也关系到中华民族在面对世界形势大变动时何以自处的大问题。

如果我们放宽眼界，将黄帝祭祀置于20世纪东亚各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就会发现黄帝并不孤独。^⑫ 如日本正是通过对天照大神“天祖”概念的改造制造了天皇“万世一系”的神话，^⑬ 并通过对古史的重构创造了日本单一民族的神话。^⑭ 朝鲜半岛则抛弃了传统的箕子先祖说，选择了据称享寿1908岁的檀

① [英] 大卫·贝尔 《发明民族主义：法国的民族崇拜（1680—1800）》，成沅一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07、204页。

② 《关于民族扫墓》，载《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4月8日。

③ 蒋天枢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9页。

④ 葛剑雄 《“国家级”公祭黄帝质疑》，载《南风窗》2003年第15期。

⑤ 马戎 《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与黄帝崇拜》，载《中国民族报》2009年4月3日。

⑥ 纳日碧力戈 《“民族”的政治文化评析：人类学视野》，载《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

⑦ 王海洲 《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⑧ 彭丰文 《北魏的历史记忆整合与国家认同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探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⑨ 李磊 《十六国前期正统性建构中的符号策略与政治表达——以石虎“天人之望”的营造为中心》，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⑩ 林超民 《从“西南夷”到“云南人”：云南多民族文化认同的演变》，载《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⑪ 林超民 《整体性：方国瑜的理论贡献》，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⑫ 王晴佳 《在神话与历史之间：现代东亚民族过去之建构》，载[德] 斯特凡·贝格尔主编《书写民族：一种全球视角》，孟钟捷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245页。

⑬ [日] 子安宣邦 《国家与祭祀：国家神道的现状》，董炳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⑭ [日] 小熊英二 《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自画像的系谱》，文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

君作为民族始祖。^①越南放弃了“鸿庞氏传说”和“安阳王传说”两个中国源头的祖源传说,改以雄王为越南民族始祖,且年年举行国家级祭祀,由党的总书记或国家主席、总理等领导亲自上香祭拜。^②可以说,20世纪是民族主义的世纪,而关于国族始祖的建构与祭祀活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一路高歌猛进,一度让人以为“历史终结了”,这其中也包括民族主义的式微。但如斯特凡·贝格尔所言,“全球化与民族化并不应该被视作两种互相分离、背道而驰的历史进程”,因为“民族历史叙事可以服务于在世界中创设一种认同之锚的目的”,即在全球化激烈的竞争中“抬高一个民族在当前全球化进程中的特殊位置”^③。更何况近年来全球形势发生变化,逆全球化、民粹主义颇为盛行,更引发我们对构建共有历史记忆问题的思考。

回望历史可见,以黄帝陵祭祀为仪式操演的黄帝符号再阐释,是在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刻开端的。今天,我们则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如何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④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大课题。

A Study of the Sacrifices to the Huangdi Mausoleum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nse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ZHANG Shunyu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Sacrifice to the Huangdi Mausoleum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ense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modern times.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revolutionaries have transformed and utilized the traditional ceremonies of the Huangdi Mausoleum and contributed to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the sense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Huangdi Mausoleum, the identity of Huangdi as the ancestor of the entire Chinese nation gradually became widely know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levant ceremony of the CPC was a kind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giving the "Huangdi Symbol" new connotations such as "working people's qualit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ina, the ceremony of the Huangdi Mausoleum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uniting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advancing the great cause of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whole country.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the integration of history and reality, sum up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eremonies of the Huangdi Mausoleum,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sense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sense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Huangdi Mausoleum; sacrifice; ceremonial system; spiritual signs

(责任编辑 伍琼华)

① 见 [美] 迈克尔·J. 塞斯 《朝鲜的神话、记忆与再创造——檀君神话案例研究》,孙宏哲译,载《韩国学论文集》第22辑,2013年。孙卫国 《传说、历史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之塑造与演变》,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② 徐方宇 《越南雄王信仰研究》,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年版。

③ [德] 斯特凡·贝格尔主编 《书写民族:一种全球视角》,孟钟捷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

④ 赵世超 《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载《陕西日报》2015年10月9日。